



语言研究论丛

YUYANYANJ IULUNCONG

第二辑



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论丛》编辑部编



语言研究论丛

第二辑

南开大学中文系

《语言研究论丛》编辑部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语言研究论丛

第二辑

南开大学中文系

《语言研究论丛》编辑部 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1/2 字数232,000

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 9072·8

定 价: 1.31 元

目 录

论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语音系统研究	岑麒祥 (1)
论汉藏系语言的比较语法	邢公畹 (22)
辅音尾在汉藏系语言声调体系中的重要性	
..... 孟伯迪(Mansier Patrick) (37)	
-m韵古今变迁一瞥	张清常 (64)
古入声字在普通话中读音的分析统计	梁振仕 (72)
汉语“咱们”的起源	张清常 (91)
从形式语言理论到生成转换语法	冯志伟 (96)
固定语及其类别	刘叔新 (156)
论词的单位的确定	
——兼谈以词为词目的问题	刘叔新 (180)
论普通话的音节结构	李新魁 (222)
试论方言词的产生和今后的发展	李行健 (257)

论“连……也……”结构宋玉柱(277)

林县方言的语法特点宋玉柱(296)

关于古代汉语名词谓语句主谓语间加

“之”的问题.....王海芬 解惠全(303)

就重刊宋本《战国策》原书进行标点工作的

一些说明.....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学小组(311)

论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语音系统研究

岑 麒 祥

引 言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语言学中一个采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或方言的亲属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的部门。这种语言学是十九世纪初西欧语言学家在研究印欧语系语言和方言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经过许多语言学家，特别是德国语言学家博普、格林和狄茨等人的努力，使语言研究冲破了过去语文学者狭隘视野和所用老式方法的藩篱，促使历史语言学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深得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赞许。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对语言教育的错误看法时说：“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近六十年来这样有力地 and 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9页）自此以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推进，研究的范围已不只限于印欧系语言和方言，而且扩展到其他各系的语言和方言。凡有亲属语言和方言存在的地方都会看见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向人们招手，引导他们向前迈进，向着无限广阔的原野前进。

很显然，就全世界范围来说，这种语言学发展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其中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有的人说，这种语言学和所用的方法只适用于西方形态结构复杂的语言和方言，而不适用于东方或其它地方的语言或方言。另有的人说，这种语言学和所用的方法是西方资产阶级语言学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属资产阶级语言学的范畴，不适宜于用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诸如此类的论调，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实际上，历史比较语言学只不过是一种采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的学科。它所研究的并不只限于各种语言的形态结构，而是涉及语言的一切部分。形态结构复杂的语言在分析比较上固然可以提供许多便利，形态结构比较简单的语言也可以从其它方面得到补偿，并不妨碍对有关语言的亲属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寻求。历史比较语言学所用的历史比较法只是一套用来搜集材料，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出正确结论和理论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在运用时它当然跟使用者的世界观和所接受的哲学上的方法论发生联系，但二者并不是同一的东西。我们不能先验地断言这种语言学必然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语言和国内外的许多语言有亲属关系。汉语有悠久的历史，方言复杂，材料十分丰富，这些对历史比较语言学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只要把这些材料有计划地搜集起来，按照历史比较法进行分析比较，从其中引出各种规律和理论，将可以大大推进我国语言学向前发展。

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牵涉到语言的各部分，语音、语法、

词汇等任何一部分都是它可以大显身手的场地，但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搞好语音系统的历史比较研究。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语音对应规律的确立

任何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或方言，不管其间的关系亲疏远近如何，我们要对它们进行历史比较研究，都应该以它们的词或词素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词或词素都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的，没有语音，它们就没法存在。因此，我们要确定亲属语言或方言的词或词素有共同来源，首先必须找出它们的语音对应规律。

什么叫做语音对应？我们要怎样确立语音对应规律呢？

所谓语音对应就是指的各种亲属语言或方言的词或词素所构成的各个语音间的一种对应关系。语音对应有全部的和局部的之分。全部的语音对应是指有关的词或词素在发音上完全相同。这在语言中是很少的，因为要有全部的语音对应，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

（一）这些对应的语音从基础语时期起直到有关语言或方言这一整段发展期间完全没有变化；

（二）它们在这一整段期间所发生的变化完全相同。这在任何亲属语言或方言的发展过程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局部的语音对应是指有关的词或词素在发音上不是完全相同，而只是有一部分相同。这在各种亲属语言或方言中是最常见的现象。我们试就汉语和汉语方言举些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北京话	上海话	福州话	客家话	广州话
田 (t'ien)①	(ɛdie)	(ɛtien)	(ɛt'ien)	(ɛt'in)
谈 (ɛt'an)	(ɛde)	(ɛtaŋ)	(ɛt'am)	(ɛt'am)
柁 (ɛt'uo)	(ɛdu)	(ɛtɔ)	(ɛt'o)	(ɛt'ɔ)

从汉语普通话、北京话和上海话、福州话、客家话和广州话这几种汉语方言的这几个词或词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意义是相同的，语音中声母方面有很严格的对应关系，可以列成如下的一个公式：

(1) 北京话、客家话、广州话的[t'-] = 上海话的[d-]
= 福州话的[t-]

这就是汉语普通话和这几种方言的一个语音对应规律。又如。

北京话	上海话	福州话	客家话	广州话
田 (ɛt'ien)	(ɛdie)	(ɛtien)	(ɛt'ien)	(ɛt'in)
棉 (ɛmien)	(ɛmie)	(ɛmien)	(ɛmien)	(ɛmin)
莲 (ɛlien)	(ɛlie)	(ɛlien)	(ɛlien)	(ɛlin)

在这些词或词素中，韵母方面也有很严格的对应关系，可以列成如下的另一个公式：

(2) 北京话的[-ien] = 上海话的[-ie] = 福州话的[-ien]
= 客家话的[-ien] = 广州话的[-in]

这又是汉语普通话和这几种汉语方言的另一个语音对应规律。一切亲属语言或方言的语音对应规律都是根据有关的词或词素的语音对应关系确定下来的。

① 这里用的是国际音标。标调用半圆形四角标调法。半圆形表示阴声调，半圆形下加一短横表示阳声调，中入用小圆形。为了便于比较起见，只标调类，不标调值。

在各种亲属语言或方言中，凡可以列成对应规律的语音，必须是发音条件相同的。如果发音条件不同，那就可能得出不同的语音对应规律。例如上面规律（1）中所列举的各个词或词素如“田”“谈”“柁”等等，都是念成阳平声的（尽管它在各方言中的调值并不相同），但是试看：

北京话	上海话	福州话	客家话	广州话
电 [tien ²]	[die ²]	[tien ²]	[t'ien ²]	[tin ²]
谈 [tan ²]	[de ²]	[taŋ ²]	[t'am ²]	[tam ²]
柁 [tuo ²]	[du ²]	[to ²]	[t'o ²]	[to ²]

在这些词或词素里，虽然韵母部分还是一样，但是由于声调不同，声母的对应关系已不相同。它们的语音对应规律可以列成如下一个公式：

（3）北京话、福州话、广州话的[t-] = 上海话的[d-]
= 客家话的[t'-]

这跟上述语音对应规律（1）是不一样的。

亲属语言或方言的语音对应规律，只要发音条件相同，在一定期间，一般都是非常严格的。可是因为语言或方言的亲属关系有亲疏远近的不同，有些亲属关系比较疏远的语言或方言，由于长期独立发展的结果，有些对应的语音在表面上看来可能相差得很远，使人几乎不敢相信它们之间有什么对应关系。

比如我国东南部和西北部有些汉语方言的亲属关系是相当疏远的。它们有些有共同来源的词或词素在发音上就差得很远。例如试比较上海话的[soʔ,](束)和西安话的[fu²](束)，福州话的[hau²](效)和兰州话的[ɕio²](效)，或广州话的[.ŋan](颜)和太原话的[ie](颜)，其中没有一个音是相同

的。我们应该怎样去确立它们的语音对应规律呢？

原来“束”，古“书玉切”，属“书”母“烛”韵字。

“书”母在相同的条件下，上海话都变成了[s-]，如“书”念[c sɿ]，“税”念[sɿ²]，西安话都变成了[f-]，如“书”念[c fu]，“税”念[fei²]等等；“烛”韵在相同条件下，上海话都变成了[-oʔ²]，西安话都变成了[-u²]，如“烛”上海话念[dzoʔ²]，西安话念[c pfu]，“辱”上海话念[zoʔ²]，西安话念[vu²]。这些还是完全符合它们的语音对应规律的。

“效”古“胡教”切，属“匣”母“效”韵字。“匣”母在相同的条件下，福州话变成了[h-]，如“行”念[ɛhiŋ]。

“幸”念[haiŋ²-]，兰州话都变成了[ɸ-]，如“行”念[ɛɸiē]，

“幸”念[ɸiē²]，“效”韵在相同的条件下，福州话都变成了[-au]。如“教”念[kau²]，“孝”念[hau²]，兰州话都变成[-io]，如“教”念[tɸio²]，“孝”念[ɸio²]，两相比较也是完全合乎它们的语音对应规律的。

“颜”，古“五奸”切，属“疑”母“删”韵字。“疑”母在相同的条件下，广州话变成了[ŋ-]，如“眼”念[ɛŋan]，

“岩”念[ɛŋam]，太原话都脱落了，如“眼”念[^cie]，“岩”念[ɛie]；“删”韵在相同的条件下，广州话变成了[-an]，如

“奸”念[kan]“雁”念[ŋan²]，太原话变成了[-ie]，如“奸”念[^ctɸie]，“雁”念[ie²]等等。这不也是符合它们的语音对应规律的吗？

由此可见，亲属语言或方言的有相同来源的语音，只要在发展过程中不受其它因素的干扰和破坏，不管在表面上看来相差得多远，仔细分析起来它们的对应规律还是非常严格的。

语音对应规律中的“例外”

话虽这样说，在各种亲属语言或方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除了许多一般的、正常的语音对应规律以外，有时也会或多或少碰到一些不受这些规律支配的“例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大家知道，任何语音的对应都是有关亲属语言或方言在语音方面独立发展的结果。这些语言或方言的语音在发展过程中总是按照一定规律演变的，因此每种语言或方言都有它自己的语音演变规律。基础语的某一个音在亲属语言或方言中可能有不同的发展，但它们之间总是可以互相对应的。这就构成了它们的语音对应规律。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任何语言或方言的语音演变规律都是只在一定时期内发生作用的，而语言或方言在发展中会不断地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可是过了这段有效期间，虽有相同的发展条件，也不再跟着发生变化了。这就构成了语言对应规律中的所谓“例外”。

例如古代汉语的[k'-]（“溪”母），在[a]、[e]、[o]之前（开口呼），北京话、上海话和福州话都仍然念[k'-]，而广州话却变成了[h-]，如：

北京话	上海话	福州话	广州话
开[ck'ai]	[ck'e]	[ck'ai]	[chɔi]
康[ckɑŋ]	[ck'oŋ]	[ck'ouŋ]	[chɛŋ]
考[ck'au]	[ck'o]	[ck'o]	[chau]
口[ck'ou]	[ck'əu]	[ck'eu]	[chau]等等。

这是很有规律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碰到，有少数几个字，虽在广州话也念成[k'-]而不念[h-]，例如：

北京话	上海话	福州话	广州话
楷[k'ai]	[k'a]	[k'ai]	[k'ai]
抗[k'an]	[k'oŋ]	[k'ouŋ]	[k'oŋ]
靠[k'au]	[k'o]	[k'o]	[k'au]

这是不符合他们的语音对应规律的。我们可以断定，这些都是因为受了普通话或其它方言发音影响的结果。

第二，一个词素的发音在整个词里因受前后音的影响极易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很少是在任何亲属语言或方言中都同样发生的。同一个音，在相同的条件下，在有些亲属语言或方言里发生变化。在另外一些亲属语言或方言里却不一定发生变化。或发生了另一种变化，因而造成一种参差不齐的现象，破坏了它们的语音对应规律。例如汉语的“婿”，古“苏计”切，属“心”母“霁”韵字，北京话应念成[ɕi²]，上海话应念成[si²]，福州话应念成[sai²]，广州话应念成[säi²]。可是“女婿”现在北京话叫[^cn yɕy²]，上海话叫[^cɲys²]，福州话叫[^cnielai²]，广州话叫[^cnœysäi²]，这样就不符合它们的语音对应规律了。

在汉语方言中，福州话最多这种因受前后音影响而发生的音变。例如同一个[^ckian] (仔 = 子)，在[ki²^ckian] (汽仔 = 汽船)里没变。在[^ctsyɛn^oyŋ^cnian] (诸娘仔 = 女儿)里变成了[^cŋian]，而在[^cts'ian] (车仔 = 洋车)里却把声母[k-]脱落了；同一个[t'au] (头) 在[et'yɛlau] (锄头)里变成了[ɛlau]，而在[^ctsienɕnau] (枕头)里却变成了[ɛnau]。诸如此类的例子都足以使我们确立福州话和其它汉语方言的语音对应规律时碰到一定的困难。

第三，有些词或词素在某种语言或方言里由于特种原因改变了读音，而在其它亲属语言或方言里却没有跟着改变，这样

也会造成语音对应规律的“例外”。例如广州人不喜欢发 $[_c k\check{a}u]$ 这一组音，认为粗鄙下流，会为人所耻笑，所以一切由古代“见”母“候”韵字发展出来的词或词素都不是念成 $[_c \eta\check{a}u]$ ，就要念成 $[_c k'\check{a}u]$ ，例如 $[_c \eta\check{a}u\ tap]$ （勾搭）的 $[_c \eta\check{a}u]$ ， $[_c \eta\check{a}u\ tsy']$ （钩住）的 $[_c \eta\check{a}u]$ 或 $[_c k'\check{a}u\ c'oy]$ （沟渠）的 $[_c k'\check{a}u]$ 等等，这样一来，就跟北京话的 $[_c kou]$ （勾、钩、沟）、上海话的 $[_c k\theta u]$ （勾、钩、沟）和福州话的 $[_c keu]$ （勾、钩、沟）等不是一对一的了。

第四：汉语方块字不是拼音文字，而以形声字占绝大多数。形声字的声旁是有表音作用的。有些形声字的声旁在形体上在某种方言里被认错了，因而影响到整个字的发音，这样也会破坏它跟其它方言的语音对应规律。例如“纠察”的“纠”古“居黝”切，属“见”母“黝”韵字，可是有些人误认为是从“斗”得声，甚至在字体上也把它写成“糾”（明张自烈《正字通》已明白指出：“俗从‘斗’作‘糾’非”。）影响所及，广州人直到现在还是把它念成 $[_c t\check{a}u]$ ，连“纠纷”的“纠”和“赳赳武夫”的“赳”也都念成 $[_c t\check{a}u]$ ，这样一来就不符合广州话和其它方言的对应规律了。

由此可见，各种亲属语言或方言的语音对应规律虽然是很严格的，但是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意外”，破坏了语音对应的规律性。我们在对有关语言或方言的语音作分析比较的时候必须予以充分注意。

对应语音在年代上的相互关系

亲属语言或方言中，凡是有共同来源的词或词素，它们在

语音上的对应规律总是非常严格的，可是由于发展过程不同，在发展中又多少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意外”，因此当中不免会有一些参差不齐的地方。这些语音中，哪些是比较古老的，哪些是后来派生出来的，我们要对亲属语言和方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语言或方言是否有书面文献，情况各不相同。如果有书面文献，我们当然应该尽可能加以利用来确定每个音及其组合方式在年代上的先后顺序以便进一步进行重建等工作；如果没有文字记载就只好利用一些语音学上的知识来断定哪一个音可能变成哪一个音，以及语音演变的可能条件等等，从而确定它们在年代上的相互关系。

我国方块字不是拼音文字，但是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了如《诗经》、《楚辞》以及各种诗、词等韵文，自魏、晋、隋、唐起并且有了比如《切韵》、《唐韵》、《广韵》、《集韵》等韵书和各种等韵学著作，此外如各种字书中的直音、反切、和谐声偏旁、声训、异文等等都可以用来做审音的参考，断定各种基础语和方言中哪些音是比较古老的，哪些是后来发展出来的。

许久以来，我国研究汉语音韵的都以《广韵》一书为主要根据。其中分韵为二百零六个：平声五十七个，上声五十五个，去声六十个，入声三十四个，平、上、去三声相配共得六十一部，内阴声韵二十六部，阳声韵三十五部，入声韵只与阳声韵相配，安排得十分整齐。这部韵书所载的虽然不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语音实录，但是我们可以断定那是以隋唐时代洛阳和金陵两地方言为基础的。因此，我们无论是研究隋唐以后各地方言语音的发展，还是探索隋唐以前的古音，都应该以

它为出发点。

《广韵》一书，除阴声韵是开音节以外。阳声韵分收[-m]、收[-n]、收[-ŋ]的三种，入声韵也分收[-p]、收[-t]和收[-k]的三种。这个体系，现在汉语各方言中，以广州话保存得最完整。如[_csa_m]（三）、[_csa_n]（山）、[_csa_ŋ]（生）、[_tap_o]（答）、[_pat_o]（八）、[_kak_o]（格）等等都跟《广韵》所载的完全相符。北京话的阳声韵，除收[-n]和收[-ŋ]的如[_csa_n]（山）和[_csa_ŋ]（生）等还保存着不变以外，收[-m]的都变成了收[-n]，如[_csa_n]（三）、入声韵韵尾已完全脱落变成了非入声，如[_ta]（答）[_pa]（八）、[_kɤ]（格）等等。福州话的阳声韵只有一个收音[-ŋ]，如[_csa_ŋ]（三）、[_csa_ŋ]（山）[_csa_{iŋ}]（生），入声韵也只有一个收音[-k]，如[_tak_o]（答）[_paik_o]（八）、[_kaik_o]（格）等等。上海话的阳声韵只有一个收[-ŋ]的还勉强保存着，如[_csa_ŋ]（生），原来收[-m]和收[-n]的都已脱落，如[_csɛ]（三）和[_csɛ]（山）等等。入声韵都变成了收[-ʔ]，如[_taʔ_o]（答）[_paʔ_o]（八），[_kaʔ_o]（格）等等。所有这些形式，哪些最古老，哪些是后来派生出来的，我们都可以根据《广韵》的材料来加以判断。

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以广州话保存古音的特点最多，我们从上面的许多例子中已可以看到。但是我们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广州话的任何种类的音都是最古老的。在声母方面，它有许多音就不及其它方言甚至不及北京话的古老。试比较：

北京话	上海话	福州话	广州话
开 [_c k'ai]	[_c k'e]	[_c k'ai]	[_c hɔi]
口 [_c k'ou]	[_c kəu]	[_c k'eu]	[_c həu]

康	[_c k'an]	[_c k'ou]	[_c k'ouŋ]	[_c hɔŋ]
看	[k'anʔ]	[k'œʔ]	[k'aŋʔ]	[hɔnʔ]
枯	[_c k'u]	[_c k'u]	[_c k'u]	[_c fu]
魁	[_c k'uei]	[_c k'ue]	[_c k'ui]	[_c fui]
宽	[_c k'uan]	[_c k'ue]	[_c k'uaŋ]	[_c fun]
阔	[k'uoʔ]	[k'ueʔɔ]	[k'uakɔ]	[futɔ]

这些古代的“溪”母字，现在福州话、上海话以至北京话都仍然念成[k' -]，而广州话一般都已念成[h]，在[u]之前（即“合口呼”）而且念成了[f -]，比较起来，其它任何方言都比它更古老。

古汉语的浊声母，除“明”、“泥”、“疑”等鼻音外，还有“并”、“定”、“群”等塞音。这些浊塞音，在北京话和广州话平声变成了送气清音，仄声变成了不送气清音。福州话无论平声或仄声都变成了不送气清音，客家话都变成了送气清音，上海话却仍然念浊音。例如：

	北京话	广州话	福州话	客家话	上海话
牌	[_s p'ai]	[_s p'ai]	[_s pe]	[_s p'ai]	[_s ba]
败	[paiʔ]	[paiʔ]	[paiʔ]	[p'aiʔ]	[baʔ]
田	[_s t'ien]	[_s t'in]	[_s t'ieŋ]	[_s t'ien]	[_s die]
电	[tienʔ]	[tinʔ]	[tieŋʔ]	[t'ienʔ]	[dieʔ]
葵	[_s k'ui]	[_s k'uai]	[_s kai]	[_s k'ui]	[_s gue]
柜	[kuiʔ]	[kuaiʔ]	[kuiʔ]	[k'uiʔ]	[gueʔ]

这一下，上海话所保存的浊音性可算是最古老的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亲属语言或方言的各种语音现象在年代上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的。有的从某一方面看来比较古老。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却又不及其它语言或方言的古老，每一